



日本中国学文薈

王晓平◎主编

中国学文薈

〔日〕狩野直喜◎著

周先民◎译



日本中國學文薈

中国学文薈

〔日〕狩野直喜◎著

周先民◎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文薮/(日)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978 - 7 - 101 - 07865 - 7

I. 中… II. ①狩…②周… III. 汉学 - 文集
IV. K20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7158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学文薮 |
| 著 者 | 〔日〕狩野直喜 |
| 译 者 | 周先民 |
| 丛 书 名 | 日本中国学文萃 |
| 责任编辑 | 孙文颖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³ / ₄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7865 - 7 |
| 定 价 | 36.00 元 |
-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期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



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的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中国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



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



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



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男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作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于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于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祖父狩野直喜传略——代序

狩野直禎

欣闻祖父君山狩野直喜先生(以下简称祖父)的学术论文选集《中国学文藪》，将作为丛书《日本中国学文萃》中的一册在中国出版，我作为其后代，欣慰之情难以言表。我衷心祝愿此书能为日中学术交流事业起到一些作用。

祖父是近代日本一位卓越的汉学家。他在继承清朝考证学(汉学)学风方面，在向国人介绍欧洲的汉学研究成果方面，都有着开创之功；他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他们帮助下，开展了对敦煌资料及有关文献的考订、研究工作；他还是我国开展中国戏曲、小说(俗文学)研究的先驱。作为日本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在长期的执教生涯中，培养了大批弟子；作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他也曾出色履行了行政职责。

在治学方面，祖父认为学者应当读书而不应当著书，“读而不作”是祖父终生不渝的治学理念。他生前出版的《支那学文藪》(1928)与《读书纂余》(1947)这两部著作，都是他发表在《支那学》、《艺文》等杂志上的论文。祖父身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史》(1953)等十部著作，多数是根据他在京都大学的讲义手稿，并尽可能参考听讲者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由此可见祖父讲稿的学术含量。我听说祖父在授课的前日，总是反复推敲讲稿直至夜深。



顺便说一句,祖父一生除了在自己执教的京都大学授课以外,从没有去外校授过课。

祖父在日常生活中,颇具宋代学者之风。在对待皇室、旧藩主以及祖先时,尤其如此。因此他把在御前进讲,当作治儒学之人的最大荣誉。他有幸四度为天皇授课,每次都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特别应提到1924年新年之际,他第一次为天皇授课,讲解《尚书·尧典》首章。为此他对讲稿几度修改,我们至今仍能在其手稿上看到他反复推敲留下的痕迹。

祖父1868年2月11日生于熊本,正值我国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开始之年。祖父的祖父是肥後细川藩的藩儒。祖父幼时,父母双亡,故他在祖父的训育下长大。祖父十二岁时,就学于新开设的同心学舍——后更名为济济黉中学校。这是一所具有儒教校风的学校,其校训是“正伦理明大义 重廉耻振元气 磨知识进文明”。1884年祖父从这所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同学中有藤田丰八(剑峰)等。祖父此前一直学习朱子学,入东京大学后师事岛田重礼(篁村)先生,从此由宋学转向汉学,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岛田先生讲课时,经常参考《清经解》一书,祖父课余曾到图书馆找出《清经解》来加以确认。这件事是祖父亲口对我说的。祖父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他终生置于座右的书,有清顾炎武(亭林)的《日知录》、宋王应麟(伯厚)的《困学纪闻》等。1895年,祖父从东京大学毕业,他没有就职,而是继续潜心研究学问。1900年,文部省派遣祖父去中国北京留学,并承诺将来京都大学设立文科大学时聘其为教授。但祖父刚抵北京,义和团事件爆发。祖父被困于日本大使馆中,当年八月被迫回国。翌年秋,又奉命转去上海



留学。

在上海期间,祖父曾有幸拜会过张之洞、吴昌硕等鸿儒名宿,不过他走动最频繁的地方,是亚洲文会的图书馆。大家知道,欧洲的汉学研究萌芽于16世纪末,而从18世纪末开始,其学术成果就不断涌现。祖父在亚洲文会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很多欧洲汉学研究的著作和杂志。祖父的讲义特别是早期的讲义,常常征引欧洲汉学家的学说。

祖父在上海留学时,很注意观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本书译出的《从〈太上感应篇〉看道教的道德》、《中国古代祭尸的风俗》,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内藤虎次郎(湖南)是一位与我祖父一起在京都创建中国学的伟大学者,但他俩却相识于上海。当时祖父在上海留学,内藤正好来中国旅行,特地赶到上海来与祖父见面。祖父东京大学的同窗好友藤田丰八,当时在上海的东文学社任教。藤田介绍祖父认识了罗振玉。祖父由此得知王国维是罗振玉的弟子,但当时尚无缘与王国维谋面。祖父与王国维相见并成为好友是后来的事了,容稍后再叙。

1903年祖父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从上海回国,可京都大学开设文科大学的计划,因受制于国家预算而延期。此时,台湾总督府委托京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织田万开展台湾旧惯调查工作。祖父受织田之邀参与其间,在织田领导下,完成了《清国行政法》一书,据说这是一部祖父执笔却没有署名的著作。

祖父在上海留学期间,中国社会上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极为高涨,对旧制度的批判也日益猛烈。祖父处身于这样的时代激流中,更加感到看似隶属历史、或者说隶属法学的制度研究,其实是



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翼。祖父奉命编纂《清国行政法》，可谓正逢其时。

1906年，京都大学的文科大学终于得以开设，不过当年度只设哲学科。祖父是文科大学的筹备委员之一，当年就任支那哲学教授。翌年新设了史学科，再过一年，也就是1908年，又增加了文学科，文科大学至此形成了完整建制。文学科一设立，祖父即兼任支那语支那文学科教授。文科大学建成的第二年，即1909年，法国大学者、敦煌学专家伯希和到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了他一年前在敦煌入手的文书资料中的一小部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京都。京都大学是日本敦煌学的发祥地，其中心人物是内藤虎次郎、滨田耕作、羽田亨，祖父也跻身其中。1910年8月，祖父与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一起，受京都帝国大学派遣，去北京调查清朝政府从敦煌搜集来的文书资料。正是在这次出差中，祖父终于与久闻其名的王国维相见了。关于这次见面，祖父在《忆王静安君》一文中回忆说：

我当时正准备着手研究元杂剧，并且已在京都大学教授元杂剧课程。恰好王静安君也在研究元杂剧，并且已有大著《曲录》、《戏曲考原》问世。于是我在此期间拜会了王静安君，听他谈论元杂剧研究，觉得很有意义。

从中可以看到，祖父与王国维都在致力于元杂剧的研究。祖父对元杂剧的研究兴趣，盖由上海留学时期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浓厚兴趣所引发。欧洲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戏曲的研究，祖父有幸在上海的亚洲文会图书馆目睹其领先于世界的研究，一定也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祖父能开日本元杂剧研究的先河，决不是偶然的。包括本书所译出的《〈水浒传〉与中国戏曲》、《读曲琐言》、



《元曲的起源与白仁甫的〈梧桐雨〉》在内,祖父有关戏曲、小说的论文,集中写于19世纪一十年代的前半。祖父也是我国红楼梦研究的开山,他1909年写的《关于中国小说〈红楼梦〉》,刊于《朝日新闻》;另有用英文写成的论文,论文题目是《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Hong - lou - Meng (红楼梦) and the Date of its Composition "TheKatsujin1 - 1"》。

1911年末,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罗振玉、王国维亡命日本。劝他们来京都居住的是内藤和祖父。此后,直到王国维1916年、罗振玉1919年回国为止,祖父没有停止过与他们的日常来往与学术交流,他们之间经常就文物资料等问题交换意见。罗、王从中国带来不少文物学术资料,其中也有敦煌出土的文书资料。祖父与外国著名学者的交流并不限于罗、王二位。1912年至1913年,祖父由京都大学派往欧洲留学,前往巴黎国立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调查敦煌文书,其间与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沙畹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留欧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914年8月,在京都帝国大学第五回夏季讲演会上,祖父发表了题为“汉文研究法”的讲演,祖父在讲演中阐述了系统研究全部经史子集的方法。这个论题涉及祖父很少作专题研究的目录学问题。他论述的研究方法,其实是自己治学基本方法的经验之谈。经学研究是祖父学问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也是他一生用力最勤的领域。本书译出的《经学概要》一文,祖父生前未曾刊出,估计写于1918年以前。原题称作《经子史概要》,但实际上仅写了经部概要。

祖父的专著《支那小说戏曲史》(1992,みすず书房)一书,主要是根据他1916年9月至1918年6月在京都大学的讲义原稿整



理成书的。1918年9月至1923年2月,祖父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文学”,1923年4月至1924年6月讲授“清朝的制度与文学”。《清朝的制度与文学》(1984,みすず书房)一书,就是由以上两部讲义的原稿合成的。

1923年,日本以中国义和团赔款为基金,开展对支(中国)文化事业活动,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祖父与服部宇之吉同为调查会委员。在开展工作时,有一个信念一直萦绕在祖父的心底,这个信念就是:学问绝不能沦为政治的工具。1925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成立,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祖父在会上,郑重提出了把“对支文化事业”改作“东方文化事业”的提案,他出于研究学问书籍不可或缺的考虑,具体建议委员会开展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

1924年度至1927年度,祖父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开设“两汉”、“魏晋”的学术与文学课程,其讲义在其身后分别被整理成《两汉学术考》(1964)、《魏晋学术考》(1968)出版。

1928年2月11日,祖父从京都大学教授岗位上按法定年龄退休。翌年4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成立,祖父就任第一任所长。后来军部通过外务省进行干涉,要求在体制上改属东方文化事业。祖父等人反对无效,结果研究所改变体制,改称东方文化事业研究所。祖父闻讯后,立即宣布辞职。祖父在担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期间,在所内曾主持“《汉书》讲读”活动,他亲自执笔写《〈汉书补注〉补》,还做过题为《汉制与经学》的讲演。为表彰祖父的功绩,1938年11月,该院为祖父建造了半身雕像。现在该雕像仍醒目地立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庭院中。



祖父的治学方法是考证学,但生活态度上却有着朱子之风。本文开头已经说过,他把入宫御前进讲之事,视作儒学者的最大荣誉。他每次入宫进讲,事先都要斋戒(吃素)沐浴。祖父前后四度为天皇授课,第一次是1924年新年。为天皇“新年初讲”是官中恒例,自1869年实施以来,直至现在每年按期举行。汉籍的“新年初讲”,惯例是讲解《四书》。但祖父认为《五经》才是儒学的本流,他的《经子史概要》,只介绍到《五经》为止,正是其观点的体现。于是祖父打破惯例,在“新年初讲”时,选讲《尚书·尧典》,讲解首章的四十二字。在解释时,他也不沿用历来所依据的朱子学解释,而是运用考证学的方法。他认为首章最重要的思想是:依靠德化,才能实现政治理想;依靠暴力的政治,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924年虽仍是大正年号,但昭和天皇已于前一年作为摄政负责起国家政务。1926年,昭和天皇正式即位后,祖父又在御前进讲了“关于古昔支那儒学政治的理想”(1927年9月、10月)、“我国儒学的变迁”(1929年11月)和“儒学的政治原理”(1932年6月)。

1947年12月13日,祖父谢世,终年七十九岁。

值此《中国学文薮》出版之际,谨以祖父传略,代为序言。

2008年12月13日

目 录

祖父狩野直喜传略——代序	狩野直禎 1
《尚书·尧典》首章解读	1
经学概要	9
目录学大要	9
《经》之名称及顺序	13
《诗》	14
《书》	23
《易》	29
《礼》	35
《周礼》	36
《仪礼》	40
《礼记》	43
《春秋》	44
《左氏传》	46
《公羊传》	49